

預行編目在中國大陸發展之回顧

A Ret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on Mainland China

劉 嘉

Chia Liu

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圖書情報中心

Library Information Center, The Second University of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摘要 Abstract】

20世紀資訊爆炸時代來臨，使得出版品數量呈幾何級數般地急速成長，圖書館編目工作的負擔也更形加重。故在圖書出版前即預行編目（在版編目）的方式，可為編目工作及讀者帶來更多的便利。本文即對中國大陸實施在版編目的發展做了一番回顧整理，包含其萌芽（1970-1985），試驗（1985-1992），及實施（1993-）等三時期，更對其在大陸地區推行的三個階段予以介紹。

With the advent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information explosion age there has been a rapid geometrical growth of the publication amount and consequently a heavier work load in the library cataloging. Fortunately the measures of the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have been worked out to facilitate catalogers and patrons of the libraries.

This article is written as a retro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up to the present on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beginning (1970-1985), experimental (1985-1992) and implemental (1993-) stages reviewed for further progress.

關鍵詞 Keyword

預行編目 在版編目 國際標準書號

CIP,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 ISBN

編者註：文中中國大陸所稱「在版編目」（CIP,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即為「預行編目」。



壹、引言

隨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資訊爆炸”時代的來臨，出版品的數量急劇增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統計數字顯示，三十多年來世界圖書出版量有如幾何級數般地增長，從1955年269,000種增至426,000種，1975年則達568,000種，每十年增加十五萬種；但到1980年短短的五年內，即增加十五萬多而達726,500^①。中國亦然，《中國統計年鑑1994》的數字顯示，1952年出版圖書僅到13,692種，1983年35,700種，每十年增加近零點七萬種；然而，到1993年十年中，已增加六萬多而至96,761種^②。這些數字無不顯示了中國社會的繁榮和科技的高速發展。

而對圖書館而言，圖書出版量的激增則意味著圖書編目工作的日益繁重。集中編目、隨書配卡等方式雖減少了圖書編目的工作量，但是由於這些編目工作都是在圖書出版後才進行的，因此圖書從出版到與讀者見面的時間仍未見大的縮短。圖書在版編目則克服了這個缺陷，它是在圖書出版前就完成的；同時，又能做到“一次編目，多方享用”，在版編目數據不但能夠為圖書館所利用，還可以被應用於出版、發行界的圖書廣告宣傳、訂購、統計和發行等工作中，因而受到多方的歡迎。如果說圖書館界統一為一個整體，形成國家及至全球性文獻資訊系統，是“世界大同”理想的一種表現，那麼，超越行業界限，圖書館界與出版、發行界這些姊妹行業更有效地合作，共同發展，未嘗不是這二理想更高境界的闡釋。由此看來，圖書在版編目的意義已不只在於它是一種編目形式，還在於是一條聯結的紐帶。這便是在版編目立意創新之所在。

貳、中國圖書在版編目的發展軌跡

1970年，中國科學院的閻立中研究員首次將

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譯作“在版編目”，並撰文介紹了國外在版編目的情況。自此，在版編目思想就開始在中國大地上萌生、發展。

中國在版編目的發展歷程大體上可分為以下三個時期：

一、萌芽期 (1970~1985)

自1970年在版編目概念的引入後，中國圖書館的專家們開始向國人介紹國外在版編目的情況，一些文章對在版編目數據的產生、發展及其應用作了詳細的說明，並討論了中國實施在版編目計劃的前景。

面對中國公共書目事業落後，書目質量不高的現狀，圖書館界認為推行在版編目是加強書目事業建設、實施書目質量控制的根本出路而寄予熱烈的期望。1974年，北京圖書館恢復了編制和發行統一編目卡片。多年來的使用證明，統編卡片的質量是好的，有權威性，為各圖書館的編目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幫助。但是統編卡片的使用中存在著編目範疇以外的問題，一是難以做到與使用單位購進的圖書在品種上趨於一致，各圖書館從新華書店、圖書貿易公司購進圖書，統編卡則自其編制機構（如北圖和上圖）另外購買，而卡片和圖書不是一一對應的，是全數訂進編制機構編制的所有圖書的目錄卡片，由編目人員在編目時再甄選，有書相對應的卡片正好被利用，無書相對應的卡片就只能做廢片處理，因而伴隨著相當數量的浪費；二是到館圖書與統編卡片有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差，有時此時間差甚至會長達一年多，嚴重影響新書編目和及時投入流通。在種種困境面前，我國的圖書館界自然而然地成了在版編目計劃的積極響應者。

二、試驗期 (1985~1992)

1985年4月，中宣部出版局約請出版界與圖書館界的有關專家，座談中國實施圖書在版編目事宜。這是中國出版界與圖書館界的專家第一次



共同討論，也是出版界第一次介入在版編目的問題，乃可喜的第一步。會上由圖書館界的專家向出版界人士介紹了國外在版編目的情況及各國的做法。與會者充分肯定了這一工作的必要性，認為在中國推行很有意義，應以積極態度實施，但要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切實可行的辦法。為此，一方面，要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實施計劃，做好充分的準備工作；另一方面，要組織幾個出版社與圖書館合作試驗，弄清楚各個環節上的具體問題，累積經驗，為制定實施計劃提供第一手資料。

會後北京圖書館與書目文獻出版社，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北京大學出版社、青海省圖書館與青海人民出版社自告奮勇，帶頭進行在版編目試驗，希望從中獲取經驗加以推廣^③。在試驗中暴露出了兩個共同的問題^④：一是出版社積極性不高，認為既增加了麻煩，又看不到任何效益；二是沒有一個合理的數據規範，幾家的做法均是仿效日本、台灣，在書名頁上印上一張詳細著錄的完整卡片，不能適應圖書出版過程中各著錄項目不可避免的更動。兩個問題的產生都源於這種分散模式的本身，說明圖書在版編目只有作為一個整體才能發揮效益，只有兼顧出版社和圖書館雙方面的便利，建立科學、合理的數據規範，才能具有現實的可行性。

1986年11月，原國家出版局與國家標準局聯合召開會議，就如何實施在版編目作了幾項決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確定由原國家出版局與國家標準局、文化部圖書館局、中科院圖書情報出版工作委員會、國家教委教材圖書情報辦公室組成工作領導小組。會後，著手各項準備工作。1987年7月，新聞出版在版編目標準。會議要求起草小組應在1987年底提出《圖書在版編目數據》和《圖書書名頁》兩個標準的初稿。1987年12月底，兩標準的初稿完成。1988年6月底，修訂

稿出爐。1989年3月1～2日，新聞出版署主持召開了兩個標準的審定會。會後不久，將報批稿上報國家技術監督局。該局於1990年7月31日批准公布，要求從1991年3月1日起正式實行。新聞出版署向各地出版局和出版社頒發了要求實施這兩個國家標準的通知。

三、實施期 (1993～)

近年來，中國實行在版編目的條件已逐步成熟。主要表現在^⑤：

(一)中國已頒布了一系列的文獻工作國家標準，使得在版編目有章可依，同時中國文獻工作標準化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

(二)不但具有多年的集中編目的工作經驗，而且在中國具有強烈要求編目工作集中、統一的願望。

(三)具有各部門、各地區的積極支持、大力協助的保證。

鑑於實施預行編目條件業已成現狀，中國預行編目領導小組正式決定由新聞出版署信息中心負責組織開始逐步實施預行編目計劃，具體業務工作由中國版本圖書館協助完成。它們的任務是^⑥：(1)組織實施和解決實施預行編目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其中涉及重大問題，需再請示新聞出版署後解決；(2)組織幹部培訓，為各出版社負責預行編目工作的幹部學習和提高業務水準創造條件；(3)組織工作協調，特別是外省市實施預行編目工作的協調；(4)組織經驗交流，形式可以是不定期發工作簡報或召開交流會。其中，中國版本圖書館要負責預行編目數據的審核、加工處理，並提供服務。

在全國推行預行編目計劃時，又區分為三步驟進行^⑦：

第一步為試驗階段。從1993年2月1日起，在北京的41家中央級出版社及北京出版社先行試驗。為辦好試驗工作，在中國版本圖書館協助下



，於1992年11月下旬舉辦了首期預行編目業務培訓班。外省市的試驗，有遼寧、湖北、廣東等。遼寧地區自1993年9月起開展預行編目工作，湖北地區從1994年元月開始。

第二步為擴大推行預行編目計劃階段。北京地區的所有出版社從1994年元月起，實施預行編目計劃。為此，於1993年11月舉辦了新聞出版署圖書預行編目第二期業務培訓班，共有146個單位的168人參加，效果很好。而且，中國版本圖書館將建立起預行編目的資訊管理系統。

第三步為全面推行預行編目階段。從1995年起，全國所有的出版社，至少應是絕大部分出版社都實施預行編目計劃。

1993年2月份以來，中國版本圖書館已為試驗單位審核、加工並返回標準的圖書預行編目數據的3,000種^⑧。為擴大影響，為試驗出版社作圖書宣傳，該館編輯出版的《全國新書目》從1993年第6期起，陸續刊登《預行編目圖書信息》，已引起廣泛注意。

縱觀此發展軌跡，可以看到，圖書預行編目在中國從理論研討到進入實質性工作，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時期，但一起步，就發展很快。看來，在全國全面推行在版編目計劃已為期不晚，委實令中國圖書館界和出版界振奮。

中國大陸開展預行編目工作之際，台灣也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台灣稱為出版品預行編目）。早在1971年（即民國60年）7月美國國會圖書館正式實施預行編目計劃的同時，台灣中央圖書館就制訂了《國立中央圖書館圖書提前編號編目暫行辦法》，擇定當時較具代表的三家出版機構——正中書局、商務印書館及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共同商討試行預行編目作業的可行性，並決議於同年9月1日開始試行。具體操作過程為：在新書出版前將其毛裝本送台灣中央圖書館編目，最後由出版社將經過審核的預行編目數據印刷在定裝

本的版權頁上為止，只有正中、學生、聯經、允晨、漢光等出版社及台灣中央圖書館、中國圖書館學會、行政院主計處等團體機構參加，申請預行編目的圖書總數約1,300種。1990年（即民國79年）2月，台灣正式成立了國際標準書號中心（以下簡稱中心），隸屬於台灣國立中央圖書館之下。中心配合國際標準書號編配的同時實施預行編目作業。一年來除圖書館界及出版界分別舉辦座談會、編制小冊子，積極開展預行編目擴大推行的準備工作外，並於1990年（即民國79年）7月完成ISBN及CIP自動化操作系統的測試。為了將來能與國家書目檔連線，ISBN及CIP檔選在TANDEM機器上運作，以Chinese MARC格式建檔，各館可經由網絡參考查詢。此外每月定期出版《新書通報》分贈各圖書館、文化中心及出版社。截至今（1991年2月，即民國80年2月）已有預行編目數據2,200條，參加出版單位增至147家。^⑨

香港、澳門地區目前尚無預行編目方面的規劃。這與當地長期受殖民主義者的統治，圖書館藏書以西文為主、中文為輔的現狀不無關係。

隨著大陸、港、澳、合之間文化交往的日益頻繁，三個地區間加強合作，共同建立中文圖書預行編目網將成爲一個努力的方向。

參、結 語

預行編目是一項跨行業的事業，在試驗過程中舉步維艱是不足爲怪的。圖書館和出版、發行業只有達成共識，並改共識爲共建，佛教上有個很好的詞稱“圓融”，三方達至如此境界，方能做到事半功倍，水到渠成，使預行編目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事實證明，預行編目加快了書目數據的編制和傳播速度；把書目數據標準化的範圍擴展到出版、發行機構；在更廣闊的範圍內消除了編目的重覆勞動。在版編目數據不但可以供國內



文獻機構使用，還可以供國外機構編目時參考。立和國內及至國際資源共享做出巨大的貢獻。這種編目形式必將為中國文獻資訊系統工程的建

註釋

- ①：UNESCO, Statistical yearbook, 1982 (Paris: UNESCO, 1982), pp.vi-15.
- ②：中國統計年鑑 1994 (北京：中國統計年鑑出版社，1994)，頁622。
- ③：陳超，「貴海省開展省版圖書館圖書預行編目試驗」，圖書情報工作，1987(4)，頁24-25。
- ④：沈乃文，「CIP在中國」，大學圖書館學報，1989(4)，頁42-44
- ⑤：黃俊貴，林德海，「文獻編目實踐與理論進展綜述」，文獻編目論文選 (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頁1-31。
- ⑥：許綿主編，圖書在版編目工作手冊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2。
- ⑦：同註⑥，頁12-13。
- ⑧：同註⑥，頁6。
- ⑨：李莉茜，「CIP制度在國內推廣實施的情形」，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館館訊，第4期 (民國80年4月)，頁17-19。

